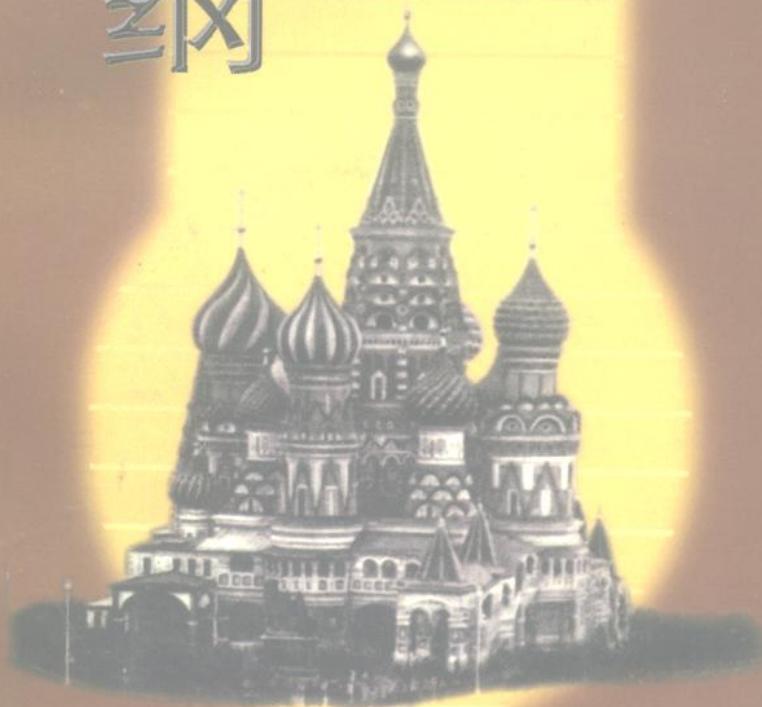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1953—1964)

陈之骅 主编

苏联史纲



人 民 大 版 社

1953.56

2

苏联史纲

(1953—1964)

陈之骅 主编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德树

封面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朱 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联史纲：1953～1964/陈之骅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0

ISBN 7-01-002455-3

I . 苏…

II . 陈…

III . 苏联-现代史-1953～1964

IV . K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12514 号

苏联史纲

1953～1964

SULIAN SHIGANG

陈之骅 主编

人 人 书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25

字数：270 千字 印数：1-4000 册

ISBN 7-01-002455-3/K · 528 定价：16.00 元

前　　言

1953—1964年是赫鲁晓夫在苏联执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之前，斯大林领导苏联长达29年（1924—1953年）。在此期间，苏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根本改变了国家的落后面貌，而且赢得了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苏联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从而显示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生命力。与此同时，斯大林执政时期的苏联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和问题。片面强调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与此有关的各项方针、政策，如果说在20—30年代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到了卫国战争结束以后，特别是50年代初期，当国家进入和平建设阶段时，它们的缺陷和弊端日益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体制改革业已历史地提上日程。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执政的。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首先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接着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关系和外交等各个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和政策调整。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许多分歧，至今仍在争论。我们总的观点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是苏联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对这一时期所进行的理论与政策调整，以及对赫鲁晓夫本人

的评价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要看到这些调整在客观上对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教条主义理论观点作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以及这些调整总的来说是在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大方向的前提下进行的；又要承认这些调整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倾向和制订具体方针、政策上的主观随意性，以及这些错误倾向为苏联以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赫鲁晓夫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倾向主要反映在对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所采取的过分做法以及在一些理论与实践中忽视乃至否定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上。从总结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历史原因与教训的角度来看，这种错误倾向所起的消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本书在阐述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历史时，对这一时期各个领域的理论与政策调整以及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观考与分析，特点是注重实际材料，不尚空泛议论，力求史论结合，以史为主，寓论于史。在赫鲁晓夫推行的众多政策调整中，农业管理体制方面的调整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说赫鲁晓夫的政策调整取得了某些成果的话，那么首先是在农业领域。例如，他取消了实行了 20 多年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改组了农业机器拖拉机站，这些措施以后再没有出现反复。本书在农业方面着力较多，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过去写苏联史，通常只是写以俄罗斯为主体的中央的历史，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则注意较少，甚至根本不作反映。本书有专门一章阐述这方面的问题，从而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苏联史研究的范围。

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在苏联演变和解体之前开始的，而完成则是在苏联演变和解体以后。在此期间，主要是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苏联和俄罗斯陆续公布了大量历史档案以及其他资料，其中有些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在本书初稿的修改与加工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地利用了这些新材料，以充实本书的内容。有些

章、节因此而部分或全部重新写过。

近年来，我国苏联史的研究工作有不少进展。特别是苏联演变和解体以后，苏联史研究的视角扩大了许多。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不仅有历史学家；还有包括政治、经济、民族、国际关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在内的各领域的学者。苏联史研究之所以受到重视不仅是因为这种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还因为它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74 年来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借鉴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提出的问题也不断增多，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和解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只能算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本书是 1991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苏联史纲（1917—1937）》的继续。从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到写作的体例和风格两书都基本一致。我们努力保持了前书的特色和优点，同时也力求有所改进和创新。由于我们各方面的能力和水平有限，也由于从写出初稿到最后定稿的时间相隔较长，书中的疏漏和错误肯定不少。我们期待着同行们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成果。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持。参加者除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外，还有来自高等院校和其他研究机构的一些学者。本书的执笔者是：

第一章	闻一	黄立茀
第二章	闻一	叶书宗
第三章	闻一	
第四章	吴恩远	
第五章	杨存堂	
第六章	陈之骅	张建华

第七章 郑 羽 (第 1、2 节)

郑绍钦 (第 3、4 节)

第八章 马龙闪 (第 1、2、4 节)

张小雪 (第 3 节)

全书最后由陈之骅统一修改、定稿

陈之骅

1996 年 6 月 1 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从马林科夫到赫鲁晓夫.....	(1)
第一节 最初的五个月	(1)
新领导班子的建立	(1)
反对贝利亚的斗争	(5)
集体领导体制	(15)
第二节 马林科夫政府的内外政策.....	(18)
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18)
内政：为了经济的高涨	(23)
外交：在缓和中求发展	(27)
马林科夫辞职	(31)
第三节 赫鲁晓夫执政	(37)
从农业打开通向最高权力之路	(43)
赫鲁晓夫在权力斗争中取胜的原因	(47)
第二章 苏共二十大和 50 年代后半期的政治生活.....	(47)
第一节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47)
大会的准备和召开	(50)
大会的主要内容	(56)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62)
大会以后的情况	(67)
第二节 苏共党内的新斗争	(67)
苏共领导机构内部矛盾的明朗化	(70)

1957 年 6 月 18 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	(70)
1957 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	(74)
第三节 赫鲁晓夫权力的进一步巩固	(82)
反对朱可夫的斗争	(82)
苏共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会	(88)
第三章 50 年代后半期的农业问题	(94)
第一节 农业生产的进展和问题	(94)
垦荒运动	(94)
畜牧业、玉米和赶超美国	(99)
农业管理方面的改革	(106)
第二节 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的改组	(109)
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管理体制的弊病	(109)
农业机器拖拉机站改组的经过	(112)
农业机器拖拉机站改组后的情况	(115)
第三节 义务交售制的变革与取消	(119)
义务交售制存在的问题	(119)
义务交售制变革与取消的过程	(121)
义务交售制取消的后果	(124)
第四节 对赫鲁晓夫农业体制改革的评价	(128)
改革的积极意义	(128)
改革的局限性	(132)
第四章 50 年代后半期的工业问题	(135)
第一节 苏联工业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	(135)
苏联工业发展的成就和问题	(135)
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客观前提的成熟	(141)
第二节 工业和建筑业改组	(146)
改组的原则和设想	(148)
改组的第一阶段（1957—1958 年）	(154)
改组的第二阶段（1959—1961 年）	(157)

改组的收缩与失败的原因	(162)
第三节 50年代后期工业生产状况	(162)
工业发展速度	(165)
工业结构和投资政策	(168)
生产力布局的变化	(170)
第五章 60年代上半期的政治经济	(170)
第一节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170)
大会的召开和主要议程	(170)
苏共新纲领	(172)
对斯大林的再批判	(182)
第二节 经济上的问题与对策	(187)
速度降低，结构畸形，效益不高	(187)
按生产原则改组各级党的领导机构	(195)
“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与试验	(200)
1963年的农业灾难	(203)
第三节 赫鲁晓夫下台	(208)
改革的失误与积怨	(208)
罢免赫鲁晓夫的密谋活动	(213)
1964年10月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和中央全会	(218)
第六章 民族政策与民族问题	(222)
第一节 民族政策的调整	(222)
为部分被流放的少数民族恢复名誉	(226)
扩大少数民族地区的自主权	(230)
其他方面推行的灵活、宽松的民族政策	(233)
第二节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教事业的发展	(233)
苏联政府经济政策的推动	(235)
加盟共和国工业的发展	(237)
加盟共和国农业的发展	(239)
加盟共和国文教事业的发展	(242)

第三节 民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42)
经济政策方面的失误	(243)
大俄罗斯主义得不到抑制	(246)
宗教政策的失误	(246)
移民政策的消极影响	(246)
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被降格	(247)
民族理论上的失误	(249)
第四节 地方民族主义的上升	(251)
地方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	(251)
地方民族主义上升的原因	(254)
第七章 对外政策与国际关系	(257)
第一节 解决战后遗留问题的政策	(259)
奥地利问题的解决	(259)
1955年四大国首脑日内瓦会谈	(260)
苏日复交	(261)
柏林危机(1958—1961)	(262)
第二节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	(265)
与联邦德国建交	(265)
与英、法等国关系的改善	(266)
与美国关系中的问题	(269)
苏联的军事战略和裁军政策	(275)
第三节 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278)
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	(278)
与南斯拉夫关系的恢复和发展	(279)
1956年10月苏波会谈	(282)
苏联与匈牙利事件	(285)
苏中关系	(289)
第四节 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	(294)
向南亚、东南亚国家提供援助	(296)

插足中东、并向非洲国家渗透	(299)
第八章 文教科技事业的发展	(306)
第一节 思想文化策的调整和“解冻”思潮的兴起	(306)
苏共发展文化的指导方针	(306)
思想文化政策的调整	(308)
“解冻”思潮的兴起和曲折发展	(312)
第二节 教育事业的发展	(316)
1958年教育改革	(316)
中等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319)
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的发展	(322)
第三节 科学技术的进步	(323)
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	(323)
科学技术取得进展的原因	(326)
科学技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28)
第四节 文学艺术领域的新变化	(329)
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多样化	(329)
戏剧、电影艺术的成就	(333)
大事年表	(335)

第一章 从马林科夫到赫鲁晓夫

第一节 最初的五个月

新领导班子的建立 1953年3月5日晚9时50分，斯大林逝世。

在斯大林的心脏停止跳动前的一个多小时，准确地说，即从3月5日晚8时至8时40分，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召开了联席会议。^① 在会上通过了有关组织问题的一系列决议：确定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建立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并确定其人选，确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及秘书处的人选，确定将一些部合并及对其部长的任命，确定了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主席人选，以及苏共中央主席团和秘书处的组成。该会议的决议于3月7日公布于《真理报》，但没有指明作出决议的日期。

这次会议后，党中央主席团的人数大幅度减少；委员由原来的25人减为10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和别尔乌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1期，第160页。多年来，有关史书都把这次会议的日期写为1953年3月6日。1991年出版的B.B.茹拉夫廖夫主编的《苏共二十大及其历史真实》也是这么写的。这就给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苏联领导人只是在斯大林死后才匆忙安排党和国家的组织问题。

辛）；候补委员由原来的 11 人减为 4 人。取消了中央主席团执行局这一机构。对中央书记处也作了调整：更换了波诺马连科、伊格纳托夫和勃列日涅夫，增加了伊格纳切耶夫、波斯别洛夫和沙塔林。

3 月 15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开会通过了政府部门的有关任命；马林科夫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为副主席。莫洛托夫兼任外长，这是在他去职四年后重返这一岗位。贝利亚兼任新成立的内务部部长。布尔加宁兼任国防部长。米高扬为国内和国外贸易部长。萨布罗夫为机器制造工业部长。别尔乌辛为电站和电力工业部长。伏罗希洛夫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在这一次人事大调整中，在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唯一没有进入政府机构担任具体领导工作的是赫鲁晓夫。这时没有第一书记的称号，给他的名分是苏共中央书记，理由是“为了使赫鲁晓夫同志集中精力于苏共中央的工作”。这种安排并不意味着赫鲁晓夫在党政机构中没有决策权。相反，他作为书记处中主要的书记，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实际处于领导党机构的地位。

事实表明，斯大林逝世后，尽管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立即组织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治丧委员会，但他们的思绪却更多地放在了没有斯大林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人的更替问题上。尽管站在前面抬斯大林灵柩的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尽管在追悼大会上发言的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但在这似乎显示了一种新的权力结构的背后，却隐藏着在领导人中间发生大变化的动荡和斗争。

在确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人选一事上，这种动荡和斗争就初见端倪。在 3 月 5 日晚间的会议，恰恰是贝利亚提出由马林科夫

来任部长会议主席的。在 3 月 15 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又是由贝利亚以个人的名义再次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对这种做法，苏共领导人是不满意的。莫洛托夫反映出了这种不满情绪，说贝利亚这样做是没有得到中央的许可的。莫洛托夫讲：“还在最高苏维埃开会前，我就打电话给他（指贝利亚——引者），试图让他放弃这一打算。我觉得，在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直接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同志提出我们党关于苏联政府首脑的建议更为正确。在和贝利亚的谈话中我也建议这样做。然而，他不同意这一建议，并坚持恰恰是由他在最高苏维埃提出这一建议。为了不引起不和，而相反，为了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不得不放弃将这一问题提交中央主席团来研究。”^①

这时，苏联领导人最担心，最害怕的是贝利亚当上内务部长，独揽大权。因为，在斯大林时期，贝利亚就长期以来掌握着实际的权力：可以决定干部的升降、人的生死。他掌握的组织系统对每个高级领导人进行监听和监视，他手中掌握着每个高级领导人的档案材料。他的阴谋手段使每个领导人都不寒而栗。赫鲁晓夫在为斯大林守灵时，曾对布尔加宁说：“有件事使我不安：斯大林死后，贝利亚会千方百计来争夺内务部长的职位。他为什么需要这个职位？他需要这个职位是为了在政府中处于这样的地位，以便有可能对政治局委员进行特务活动，窃听、监视，制造事端，搞阴谋，而这会给党带来极坏的后果”，“我说，决不能允许出现这种情况，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覆灭”。^②

但事实却是贝利亚当上了内务部长。这无疑增加了苏联领导人的不安和担心。而在哀悼斯大林期间，报纸上都明显突出马林

① 《苏共中央通报》，1991 年第 1 期，第 161 页。

② 同①，第 150 页。

科夫。这使马林科夫极为不安和担心。因为，在现在的领导人中，在斯大林时期，无论在职位上和权威上他的地位都是最脆弱的。他当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从苏联一班领导人的角度说，这也许是他们阻挠贝利亚担当此职的一种折衷措施。从贝利亚的角度说，也许这是他实现更大的政治阴谋的一个危险起点。对此，莫洛托夫曾作过解释：“他（指贝利亚——引者）决定在马林科夫背后行动。而不是自己来担当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因为他没有这样的威信。”^①

马林科夫担心报刊上对自己的突出宣传会导致贝利亚的阴谋行动。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林科夫作出了一些政治姿态。在斯大林葬礼的第二天，即3月10日晚上，马林科夫召集了中央主席团会议，还让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波斯别洛夫和《真理报》总编谢皮洛夫参加了会议。马林科夫主要讲的是在报刊有关葬礼的报道中苏共领导人的排名问题。马林科夫对报纸发表的一幅“斯大林、毛泽东和马林科夫同志在一起”的照片极为恼火。除了这张照片是拼凑的外，马林科夫说，这是一种发展多年的政治趋势。他认为，“在我们这里有极不正常的情况，许多事都是按个人崇拜的路线进行的”，“我们认为应该停止执行个人崇拜政策。”^②

这则档案资料，目前被广为引用。但都是只有这两句话，而且中间不连贯。我们很难判断其准确的用意。但有一点却是十分明显的，即在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五天，马林科夫讲要停止执行个人崇拜政策，这明确是指在报刊上不要再因袭斯大林时期的做法，突出宣传他个人了。没有任何史实表明，马林科夫这时所指的个

① 丘耶夫，Ф·《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莫斯科，1991年第332页。

② 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629宗，1目，54卷，2页。转引自茹拉夫廖夫主编：《苏共二十大及其历史真实》，第12、13页。

人崇拜政策包含了赫鲁晓夫三年后所批判的那么广泛的内容。即使是不再宣传斯大林这一做法，也不是马林科夫个人的意见。

新的苏共领导在苏联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在政治趋势不十分明朗化的情况下，不可能贸然去完全支持或者反对斯大林长期执行的政策。对于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领导成员来说，他们对斯大林的专断领导作风有切身的体会，都多多少少感受过这种专断的不利影响。所以，把“停止执行个人崇拜政策”局限于不再宣传斯大林，不突出领导人中的某个人的范围中，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因而对每个领导人来说，在这种政治气氛中执行一种淡化斯大林、淡化最高领导、笼统倡导集体领导原则的路线是最适宜的。所以，《真理报》4月16日在社论中写道，集体领导方法是党领导的基本原则。破坏这一原则是束缚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官僚主义表现，而严格遵守这一原则则是实施正确领导的保证、发扬党内民主的最重要条件。

由此可见，苏联领导在斯大林逝世后达到了政治上的一种暂时的平衡。这实质上是一种权力的真实状态。不过，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很久。

反对贝利亚的斗争 在苏联最高领导人中，贝利亚最不甘心这种平衡和安于这种状态。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他采取了一些措施。

贝利亚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出了大赦犯人的建议，要求对被监禁的犯人减刑，释放一些犯人，但要被释放的犯人划定特别居住区。根据这一建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3月27日颁布了“大赦令”。根据这一命令，将有约一百万犯人获释，但不包括刑期在5年以上的反革命罪犯、盗窃社会主义财产的重大犯人、抢